

清华大学人文社科振兴基金资助

——清华人文学者对中国翻译的贡献

# 译德载物

穆凤良  
许建平 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清华大学人文社科振兴基金资助(2010WKHQ014)

# 译 德 载 物

——清华人文学者对中国翻译的贡献

穆凤良 许建平 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译德载物 / 穆凤良, 许建平著.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7-5439-4909-6

I. ①译… II. ①穆…②许… III. ①翻译家-列传-中国 IV. ①K8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 第128120号

责任编辑: 谭 燕

封面设计: 周 婧

**译 德 载 物**

——清华人文学者对中国翻译的贡献

穆凤良 许建平 著

\*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长乐路746号 邮政编码200040)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江苏常熟市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740×970 1/16 印张10.25 字数162 000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39-4909-6

定价: 25.00元

<http://www.sstlp.com>

境自远尘皆入咏，物含妙理总堪寻。

清·乾隆，题于颐和园

# 前 言

谈及翻译及其批评,当下流行的翻译理论门类繁多,诸如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学派、历史学派、解构主义、接受理论、描述翻译学、对等论、阐释学、目的论、异化论、互文性、符号学、多元系统论等,这些远未穷尽,还只是部分的列举。在流行思潮之外,翻译的社会学分析虽然不够新颖时髦,却历来属于常规性的研究。

其所以呈现常规性,是为翻译实践自身的社会性所决定的,它既服务于个人的完善,又服务于社会的发展。从社会的发展来看,一种文化很难独善其身。以俄罗斯为例,在其文化发展进程中一直希望融入欧洲,一直存在忧患意识。所以,在沙俄时代,俄罗斯贵族讲法语。乃至今天,仍然有很多俄国人学习法语,以及其他西方语言。然而,俄罗斯还是一如既往地被排斥在西方之外,其忧患意识未见减轻,他们还需继续努力融入世界。至于中国的忧患,如果忽略其内因不计,其外部环境全然不同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日本、韩国、菲律宾,在于中国更容易陷入东方与西方的对阵之中,以至于类似俄罗斯,也被排斥于西方之外。所以,从前乃至今后,只要中国想融入世界,就要关注政治缓冲和文化借鉴,而文化借鉴和政

治缓冲往往需要翻译的斡旋。从个人的完善来看,地方意识会因其狭隘而降低思想和沟通的质量,翻译是养成全球意识的有效渠道之一。《译德载物》正是关联着翻译与语言认知、社会发展和文化借鉴的一本书。

与其泛泛而言,不如谈谈我们具体的思路。《译德载物》,顾名思义可以衍生二义。一是要研究翻译思想,上升到“德”的高度。诗人罗伊·坎贝尔曾经调侃“翻译(好比妻子),只要略有几分姿色,便早有绝对忠实者”。<sup>①</sup>本书的案例中所讨论的人物却是绝非肯屈尊于“妻子”地位的人。不过“忠信”却是为人之本。他们既然涉足翻译的讨论或实践,气场再大,也不能回避“信”字。令人叹服的是,他们或者把翻译当作是抱养的孩子,或者担当起后娘的责任,而且是非常成功的后娘,成功地翻译或收养了一系列的舶来文化因子。读者从中可以看到,他们之所以伟大,天资和勤奋必不可少,爱心和敬业也是他们的共性。所以,他们比常人更好地解决了信的问题。二是要探讨翻译影响,推及到“达”的广度。本书列出的人物治学一定有方,话语一定有力,译文一定有趣,影响一定深远,而且自信如孟子所言,“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这些都贯穿在本书的写作目的、选材范围和研究方法中。

若论本书的目的,虽然我们展示的可能是极其微观具体的案例,宏观地说,我们是为了纪念那些与清华大学有过教学关联,并为中国文化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的学者们,特别聚焦在他们的翻译贡献上。回顾中国近现代的转型,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研究成果会频频进入检索的视野,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华大学文科历史的悠久。早在1925年,学校就设立了国学研究院,1926年分设国文、历史、社会学等系,1928年设立文学院和法学院。在教学方针上,与当时其他众多大学的不同之处是清华的多数院系特别强调“中西融会、古今贯通”。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为例,其办学目标并非狭隘地界定在整理国故上,而是既植根故土,又吸收西学,养成现代科学的方法,培育著书立说的人才,以立足于振兴中国文化。一方面观其定位,即便在今天,该办学宗旨仍然凸显着其前瞻性。另一方面,在振兴中国文化的前瞻性

<sup>①</sup> 王英:《新英语教程——读写译3》,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

目标下,国学院聚集了一批济世人才,以其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为例,他们既是当时中国的思想栋梁,也是东西文化交流的语言桥梁。在思想栋梁的一面,梁启超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王国维是末代皇帝的读书顾问;陈寅恪是积极维新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后代,既秉承了旧学家风,又有13年的留学积累,堪称东方学的旗手;赵元任则是兼通文理的跨学科和跨文化的人才。他们的著作常常为学界关注,可见,他们的史学意义已经得到确定。另一方面,从他们撑起的语言桥梁延伸开来,译界研究上述四位学者译学造诣的兴趣也在呈上升态势(李昌银,2003:101—104;罗选民,2006:47—51;蔡新乐,2006:53—56;许建平,2005:101—106)。

在如此宏大的背景下,在中国文化的进程中,我们收集前辈成功的案例,总结他们丰富的实践,摘录他们建树的理论,描述他们走过的足迹,宗旨是在流行的思潮中融入一些常规的成分。所谓常规,可能是一些老生常谈,然而,老生常谈常常比昙花一现的价值更加恒定、更加源远流长,也比新鲜时髦的理论更加根深蒂固。

若论选材范围,本书原定要研究78位曾经在清华大学工作或学习过的学者。从早期国学院的“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到稍后中文系的朱自清、闻一多,从哲学系的贺麟、金岳霖,到外语系的钱钟书、季羨林,清华人文似乎毫无例外地与我国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不同的方式或多或少地介入了中西语言文化思想的融会大潮。尤其在1926年成立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之后,该系涌现出我国许多著名学者和教授,如曹禺、钱钟书、季羨林、查良铮、王佐良、许国璋、李赋宁、英若诚、胡壮麟等,他们为清华大学外语系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原本都纳入了我们的研究视野。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发现工程太大,所以只保留了原选的几个,其余作为“清华译学相关人物小传”,列在附件中。现在的正文中除了包括上述的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还包括在文化学术界建树颇丰的金岳霖、梁实秋、钱钟书、王佐良,他们分别为我国国学、哲学、文学、历史学、语言学、外语教学等领域公认的大师。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在外面完成了学业,来清华大学发展;一些人是在清华大学完成了学业,到社会上建功立业。

若论研究方法,我们虽然不能不受传统的影响,但从内心却愿意接受新

思维。翻译研究开宗明义,不该囿于门户之见。我们之所以打开清华大学的翻译门,目的是归纳、总结、交流、借鉴。笔者曾经在研讨会上遇到一位曲阜师大的同行,她处在理论的漩涡中,困惑地问道,这么多翻译理论,互相间常有抵牾,到底谁是谁非呀?其实存在就是现实,各有各的道理。特别是在多元化的今天,我们不再从一个方面出发,例如,论及王国维投昆明湖自尽,有人说他是抗议北伐,有人说他是为了追随封建王朝的破灭。为什么要给他一个负面的定性呢?每个人都具有相对的“独立之精神、思想之自由”(free will),所以表现才各有差异。

在以下各章中,我们探讨的正是各位大师个性鲜明的文章、高屋建瓴的视野和引导未来的魄力。本书的前四章为穆凤良所作,后四章为许建平所作。正文之外,书后的附录“清华译学相关人物小传”为许建平教授收集整理。现就正文部分评述如下。

第一章“重逻辑对比,示来者轨则”是通过回顾王国维的翻译理论与实践,探讨翻译史的影响因子和翻译活动的常规特征,诸如翻译的投机与冷遇、良莠不齐与文化错位、中西思维的对比等。纵观历史,王国维推动学术的作用可谓至关重要,而且影响至今。他不仅是中国文史哲领域继往开来的大师,也是翻译理论家和翻译实践者。他不仅做有影响的翻译专论,例如“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而且,他的文史哲著作也同样影响着译界。该章采用历史人物对比的方法,对比严复与王国维,对比梁启超与王国维,以说明翻译的投机与冷遇的关系;对比辜鸿铭与王国维,以说明中西思维的差异。该章的理论架构是基于中西语言、思维、逻辑的对比。人类的思维没有本质的差异,然而,逻辑的表达受语言符号的影响至深,却常常由于我们太熟悉双语的分属状态而忽略了差异的对比,抑或是过于忠实源语的文体风格而忽略了目的语的移植条件。王国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等论文中提出的逻辑分析和在“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等论文中提出的文化对比,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国译界的学术走向。由此我们得出结论:王国维的学术实践给予我们的启迪,一方面能够有助于建立基于逻辑的翻译模式:逻辑是语言表达最本质的属性。只有把握了语言表达的最本质的属性,才能译得精确,翻得合理。另一方面,王国维在中西语言思维逻辑的分析中,开对比先河,

示来者轨则,揭示了学术贡献往往不在于轰动一时的学术投机,而常常在于甘愿寂寞的基础研究。

第二章“学术大家勤于译事”是从翻译思想和翻译实践两方面来讨论梁启超的译学贡献。从翻译思想而言,梁启超既遵循求真求实的翻译传统,又服务于中国近现代革命思潮的需要,所以在翻译实践上积极推行梁启超式的输入,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鲁迅的快译。梁启超和鲁迅二人都为开阔视野和扩展思维积极投入到翻译的理论和实践中,充分调动了翻译的文化借鉴功能和借力发力的革命元素。然而,若论功绩,梁启超毕竟发力在先,开创新河,通过梁启超式输入法的研究有助于理解鲁迅的快译选择。

第三章“学西方与东方学”是从文化对比的角度审视陈寅恪的治学路径。在中外文化交流中,陈寅恪的游学之路最为辽阔,修养堪称深厚,乃至文化既是他的生命,又是他的信仰,还是他的终极关怀。通过研究佛经翻译,陈寅恪构建了他的东方学核心,从而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考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通过研究西方来认识东方,陈寅恪充分演绎了全球视角和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

第四章“兼通文理与横贯东西”介绍了赵元任的译学贡献和跨学科的重要意义。赵元任是一位跨文化的奇才。他专修物理而兼通文化,学识渊博能横贯古今东西。在倡导学科交叉的今天,赵元任既是破除地域的和文化局限的前辈,又是展示全球视野的一个杰出范例。

第五章“‘译意’与‘译味’”对金岳霖在我国译学领域的建树做了探讨。金岳霖的《知识论》第15章专题讨论了语言和翻译,从新的视角阐述了两种不同的翻译方法。他摒弃了传统的“直译、意译”的提法,首次提出“译意”和“译味”的概念。本章对“译意译味”说做了分析探讨,认为与传统的“直译、意译”相比,它更能切中要害。它不但拓宽了研究的视角,而且更能揭示出问题的本质,减少不必要的纷争。更重要的是,金岳霖用哲学家的睿智为后人奠定了一种新的翻译模式和思维方法。本章还用翻译实践的译例对金岳霖的“译意译味”的现实意义进行了验证,进而肯定了金岳霖对我国翻译界建设所作的开拓性贡献。他的贡献在于他提醒我们对语言哲学的关注,从而回归理性的思考。

第六章“‘达意’与‘存真’”总结了梁实秋莎剧翻译的艺术特色与卓越贡献,即便只用了咫尺篇幅,也足以让我们看到梁实秋真、善、美的价值取向、跨文化的沟通能力和信达雅的表现能力。由于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梁实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颇具争议,乃至梁实秋的译著在中国内地长期受到禁锢,他的许多重要学术贡献被人们所忽视。“‘达意’与‘存真’”一文在全面综述梁实秋生平业绩和学术贡献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了梁实秋作为翻译家为中西文化交流付出的巨大心血和卓越非凡的贡献,恢复了对梁实秋客观、公正的评价。

第七章“‘最高标准’与‘最高理想’”解释了钱钟书的“化境论”,三个字概括了在翻译实践中流动的中国文化精髓,往往被认为是“翻译的最高标准”而广为引证,在我国翻译界有着重大的影响。本章根据现有资料,从不同角度对“化境”说作了新的解释,指出“化境”并非文学翻译的标准,而是译者所应追求的理想境界,并试图以此来澄清有关“化境”说的各种误解。

第八章“再现人物神韵的典范”赏析了王佐良所译的《雷雨》片段,为中国文化走出国门融入世界开启了一扇心灵之门。上一代的王佐良和杨宪益等人曾经为传播中国文化做过大量的译介工作。今后,此类推介中国繁荣世界的翻译工作将有更多的选择、更宽的面向、更大的资助,更好的翻译。因此,汉译英的规律探讨也会越来越重要。

上述八位学者尽管地位高低有别,有的位尊君师,有的入阁政府,有的身为教授,他们的共性却都是学贯中西,造诣高深,躬身译学,并由此推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其贡献有待于深入地评估,其开拓性和桥梁作用有待于后续的解读、重构和传承。

综观清华人文的译学历史渊源,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种发人深省的现象:以上八位清华人文大师,除赵元任之外,都不是专门搞语言研究的;除曹禺、钱钟书以外,都不是外语科班出身(而曹、钱的卓越建树均不在外语方面),但他们都是人文领域中各自学科的巨匠。他们昔日在译学领域的建树对我们今天振兴和发展文科,对培养新世纪复合型、创造性人才无疑具有很大的启迪。

谈及启迪,灵动第一,正所谓“词无定译”(“inscrutability of reference”,

“the interpretation of various lexical items is still not fixed”),“译无定法”(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sup>①</sup>善于从高深莫测中洞悉真谛,手眼身法必不拘泥。然而,万变不离其宗,“文之为德也,大矣”(刘勰《文心雕龙》)。光阴荏苒,斗转星移,清华人文学者求实创新的传统仍然在鼓舞和鞭策我们。我们深切地体验到,“译德载物”是清华大学建校伊始的实践,是我们向往的境界,也是我们一贯孜孜以求的目标。

本书目前涵盖的仅仅是其冰山一角。即便是这一角的出世,也让我们深受鼓舞,心怀感恩。我们要感谢历史上的清华人文学者对中国翻译的贡献,给我们带来今天的感悟。我们要感谢清华大学的文科振兴基金,给我们研究和出版的资助。我们要感谢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的编辑为了本书的出版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我们还要感谢我们的领导、同事和朋友为我们立项提出修改建议,为本书的出版提供有利的条件。最后要提到本书的合作者许建平教授,他在翻译研究领域堪称根深叶茂。同在译界,我没有畅销的书,例如我的《逻辑比较与英汉翻译》,有读者索书,我却无书可送,该书仅一次印刷,就已淡出市场。而许建平教授的《英汉互译实践与技巧》却经久不衰,前后三版二十几次印刷,销售了十几万册,让我叹为观止。更让我钦佩的是,他古道热肠,乐于助人,扶持新人,不计得失。本书的问世,全在于他的掌舵。他对本书的规划缜密细致,他对立论的高度提升自如,他对文稿的修改醒目醒脑。与他的合作拔高了我的视野,陶冶了我的品位,完善了我的治学,让我深感孔子之言极是,二人行,他是老师。鉴于与许建平教授的合作既轻松愉快,又催我奋进,让我看到本书的合作还仅仅是开始,我们还有许多未了的历史、未了的话题、未了的合作,指向未了的将来。

穆凤良

2011年4月于清华园

① “词无定译”见 Saul A. Kripke. *Wittgenstein on Rules and Private Languag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57; “译无定法”见 W. V. Quine, *Word and Object*. Cambridge, Mass.: MIT, The Technological Press, 1960. p. 27.

# 目 录

|                                    |       |
|------------------------------------|-------|
| 前 言                                | / 001 |
| 第一章 重逻辑对比,示来者轨则——论王国维的译学贡献         | / 001 |
| 第二章 学术大家勤于译事——论梁启超的译学贡献            | / 020 |
| 第三章 学西方与东方学——论陈寅恪的译学贡献             | / 039 |
| 第四章 兼通文理与横贯东西——论赵元任的译学贡献           | / 048 |
| 第五章 “译意”与“译味”——论金岳霖在译学领域的建树        | / 056 |
| 第六章 “达意”与“存真”——试论梁实秋莎剧翻译的艺术特色与卓越贡献 | / 063 |
| 第七章 “最高标准”与“最高理想”——钱钟书“化境论”新释      | / 073 |
| 第八章 再现人物神韵的典范——王佐良译《雷雨》片段赏析        | / 078 |
| 附 录 清华译学相关人物小传                     | / 085 |
| 后 记                                | / 147 |

# 第一章 重逻辑对比,示来者轨则

## ——论王国维的译学贡献<sup>①</sup>

### 一、引言：翻译史的积极影响和翻译活动的常规特征

中国近现代的文化大师常常不仅熟谙历史,同时还热心于翻译,王国维就是这样一位翻译家。只是因为王国维在许多方面都造诣颇深,所以,郭沫若评价他为“新史学的开山”。<sup>[1]</sup>鲁迅也曾经通过翻译评论,盛赞王国维的国学贡献。他说:“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sup>[2]</sup>于是,尽管王国维翻译有术,并且得到译界的认可,人们却很少称他为翻译家。

无论把王国维划入何种学术范畴,他的翻译实践都能给予我们一个清醒的提示:在中国,不懂历史就很难深刻地理解翻译。因为中国的翻译史经过从寄、象、鞮、译的初级阶段向翻译升华的历练。初始的模式只需简单的交际,而当我们开始使用“翻译”这个术语的时候,该术语本身已经比单个的“译”字蕴涵了翻译实践中更加丰富的常规特征,例如异质性的归化,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兼顾等。

翻译实践中的常规特征是逐渐丰富的。最初,通译不叫翻译,究其原因不外乎由于下列因素所致。一是因为译事在文字发明之前就已经存在于不同的民族之间,双方的沟通常常是单纯的交易多于复杂的思想,有共时性而无历时性。二是即便在文化昌盛的西周盛世,“重九译,致殊俗”。<sup>[3]</sup>共时性和历时性都初见端倪,译事却只需根据地域差异的大小分别采取寄、象、鞮、译这些不同程

---

<sup>①</sup> 本文初刊于辅仁大学翻译研究所编辑:《二零零九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三届“两岸四地”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研讨会论文集》,台湾:致良出版社有限公司,2009:229—240。

度的译语,就已足矣。三是因为初期的译事活动往往不具有广泛性,也就是说,译语或译品没有必要家喻户晓。据《礼记》记载,远古时代,“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sup>[4]</sup>此四方之官为先王所设,司沟通之职。寄司九夷,“言能寓风俗之异于此”;象胥通六蛮,“言能仿象风俗之异于彼”;“鞮,则欲别其服饰之异”,兼通七戎之语与中国相知,译知八狄,所以“辨其言语之异”。陈澧指出,寄、象、鞮、译“皆主通远人言语之官”,“周官通谓之象胥;而世俗通谓之译也”,<sup>[5]</sup>是因为天下常常太平,唯有北方多事,所以突出了译官。此后随着佛教的兴起,从汉末到隋唐,“译”事由“象胥”渐渐过渡到了“翻译”。在译经深入中国之后,译者发现,“译”术已经不能满足受众的需要。为了便于诵经,译者需要添加翻译的手段,而“翻也者,如翻锦绣,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sup>[6]</sup>于是,在隋唐的记载中,我们开始看到“翻译”一词的问世与使用。例如《隋书》说:东汉末年,“章帝时,楚王英以崇敬佛法闻,西域沙门,赍佛经而至者甚众。永平中,法兰又译《十住经》。其余传译,多未能通。汉桓帝时,有安息国沙门安静,赍经至洛,翻译最为通解。灵帝时,有月支沙门支谶、天竺沙门竺佛朔等,并翻佛经。而支谶所译《泥洹经》二卷,学者以为大得本旨”。<sup>[7]</sup>又如,“今之佛经,罗什所译,姚兴执本,与什对翻”。<sup>[8]</sup>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出,只译不翻者“多未能通”,既译又翻者,方能心悟神通,实现诵读两便。

## 二、中外思维的对比

通过对“象胥”到“翻译”的演变来看翻译实践中的中外思维比较,比较的程度是在逐步提升的。我们可以分别从古代、近代、现代的各个时段中列举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古代的中外思维比较以翻译印度佛经最为典型。从东汉末年的动荡岁月开始,有安世高和支谶等人的传教,到东晋释道安时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语言和文化的比较知识,例如“五失本”:一曰:“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二曰:“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三、四、五条都谈及翻译的削繁从简,删冗求显。<sup>[9]</sup>在汉魏唐宋的佛籍经序中,释道安的译论最能承前启后。他主持译“胡经”不拘泥于梵文的一板一眼,在化异质于本土化的过程中,堪称中外思维比较的一位出色的先行者。

近代的中西思维比较先是由西方耶稣教传教士发起。且不说著名的《利马窦中国书札》,就连不太出名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于1890年出版的《中国人的特性》,至今已有9个中文译本,说明中西思维的对比受到了中国出版业的重视。

经西方传教士拉开中西思维比较的序幕,中国人掀起了新一轮的西域研究热潮和现代化的改革。严复于1895年发表了“论世变之亟”,指出中西思维的差异在于:

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sup>[10]</sup>

严复此处所作的比较还比较表面化,仅仅侧重于政治文化的行为,并未涉及语言逻辑。继严复之后,王国维推出的中西思维比较,相对而言,更具有现代意义,更侧重语言逻辑。凭借大量的翻译实践,王国维在20世纪初发表了“论新学语之输入”、“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和“《国学丛刊》序”等一系列论文。从宏观而言,王国维倡言“学无中西”和古今相通,从而使古代传承到当代,使中国学术融入世界的学术背景之中。其中古今的传承不必细说,外来思维大规模融入的过程,中国至少经历了两次。据王国维归纳,一是汉唐之际的“佛教之东适”,“至宋儒出而一调和之”,二是“今日,而第二之佛教又见告矣,西洋之思想是也”。<sup>[11]</sup>比较而言,佛教汉化的开端比起“学无中西”的过程要更加困难。因为,佛教提倡出家和出世的思想,与儒家入世的传统思想相悖。针对“中学”与“西学”谁主沉浮的持续争议,王国维指出中西思想的共性,即中西思想“同为人世间的,非如印度之出世间的思想,为我国古所未有也。且重洋交通,非有身热头痛之险,文字易学,非如怯卢之难也,则我国思想之受动,宜较昔日为易”。<sup>[12]</sup>这个受动的前提是“知力人人之所同有,宇宙人生之问题,人人之所不得解也,其有能解释此问题之一部分

者,无论其出于本国或出于外国,其偿我知识上之要求而慰我怀疑之苦痛者,则一也”。<sup>[13]</sup>由逻辑的相似性和交通的便利性可以建立文化的亲缘性,自然会得出学无中西的认识。然而,学无中西不能抹杀视角的差异,人类的共性不能抹杀民族的个性。王国维指出:

西方学术“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不用总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sup>[14]</sup>

王国维让我们认识到,中国人的思维逻辑和表达习惯既有所短,又显其所长,例如长于具象的表达,就会有“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sup>[15]</sup>

### 三、逻辑学的翻译和翻译的逻辑律

王国维注重东西方逻辑思维的对比,不仅表现在理论认识上,还表现在他的翻译实践中。侯昂好和文学锋指出,最早介绍西方逻辑学进入中国的有明代李之藻的《名理探》,然而,在现代西方逻辑学的译介中,以完整为计量,王国维当属第一位译者,严复次之。尽管严复在1905年译《穆勒名学》,但却只译出了半部。1909年严译《名学浅说》比王国维所译《辨学》迟到了一年。<sup>[16]</sup>

从翻译规范的角度看,王国维的翻译一般不会引起争议。以《辨学》的翻译为例,虽然不是字字精准,但也堪称字通句顺,译笔流畅,而且能够通过逻辑学的翻译来反映翻译的逻辑律,例如关于简约律、先后律、抽象具象律、语态律、分合律、增删律的英汉对比与翻译运用。

#### 1. 简约律

英汉各自有其或简约或铺垫的需求。英语简约处,汉语可能需要铺张;汉语简约处,英语却需要增益。例如:

(1) 原文: Logic may be most briefly defined as the Science of Reasoning. <sup>[17]</sup>

汉译: 辨学之定义,约而言之,则推理之科学也。<sup>[18]</sup>

分析: 英语“briefly”用“约而言之”翻译,是因为英汉词语的凝固律不同,所

以，尽管四字译一词略显铺张，却符合译入语的成语规律。

(2) 原文: By a Law of Thought we mean a certain uniformity or agreement which exists and must exist in the modes in which all persons think and reason, so long as they do not make what we call mistakes, or fall into self-contradiction and fallacy. [19]

汉译: 思想之法则, 谓人人思索中, 限其不谬妄或不自相矛盾时, 有一种不变之定律是也。[20]

分析: 英语的主、谓、宾是不可简约的成分, 汉语不然。此处汉译将介词短语“by a Law of Thought”转为主语, 于是“we mean a certain uniformity”中的“we”就被省略了。

(3) 原文: in such cases no science, in the proper sense of the word, is possible. [21]

汉译: 对此等事物, 决不能有真科学。[22]

分析: “in the proper sense of the word”, 7 个英文单词被一个“真”字所译, 可谓简约到极致。

(4) 原文: Iron is one of the metals, and metals are elements or simple indecomposable substance, in the sense of being among them or a part of them but not as composing the whole. It follows necessarily that “Iron is one of the elementary substance.” [23]

汉译: 铁之为金类, 金类之为原质, 皆为其中之一部分, 而不蔽共全体, 然吾人必谓铁为原质之一。[24]

分析: 在“metals are elements or simple indecomposable substance”句子中, “or”前后为同义语的反复, 所以只译“or”前面的文字为: “原质”, “or”后面的文字“不可再分的单质”被简化掉了。在“in the sense of being among them or a part of them”短语中, “or”前后为相等词语, 所以只译“or”后面的文字为: “其中之一部分”, “or”前面的文字“在它们之中”被简化掉了。

从上面各例来看, 简约律不是肢解原文, 而是拨冗清障, 以便彰显原文, 方便阅读。

## 2. 先后律

英汉语序的不同有一定的规律性。在主从句的结构中, 英语的先后位置比